

In Aufhebung der Negation
wird das Gute nicht
vernichtet, sondern in sich selbst
aufgehoben, und das Gute
ist in seinem Wesen
bestehen.
B. 12. 18.

Hegel



Hegel's Nature and Destiny

黑格尔的本性与命运

章忠民 著

黑格尔的本性与命运

章忠民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格尔的本性与命运/章忠民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642-1675-7/F·1675

I. ①黑… II. ①章… III. ①黑格尔,G. W. F. (1770~1831)-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0383 号

- ☐ 责任编辑 刘光本
- ☐ 责编电邮 lgb55@126.com
- ☐ 责编电话 021-65904890
-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HEIGEER DE BENXING YU MINGYUN

黑 格 尔 的 本 性 与 命 运

章忠民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春秋印刷厂装订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6.25 印张 416 千字

定价: 38.00 元

内容提要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演绎中,对于理性主义的追求与批判、对于理性王国的追寻与反拨,始终是最为重要的线索。那么,站在当代地平线上重新反省盛极一时却又衰退变形的理性主义、重新审视曾经光彩夺目却继而黯然失色的理性王国,又会有怎样的观感和收获呢?基于这种想法,我们以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集大成者和理性王国最大的缔造者黑格尔为重点研究对象,立足于当代视野,突破黑格尔研究的既有模式,在尽显黑格尔理性观念演绎的轨迹及其自身结构的拓展与解构过程中,诠释理性的自我和解功能及其对人类认知、价值的引导作用。由此,揭示黑格尔的本性与命运,展示黑格尔的真切内涵与当代意义,解读黑格尔成为现当代各种思潮批判的焦点之秘密,呈现理性主义的走向;提供解读黑格尔思想脉搏的新视界、新思路与新方法,提供透视西方理性王国发展演绎的路径与参照。具体要点如下:

1. 黑格尔理性观成为各种思潮批判的焦点的原因及意义

黑格尔理性观既是对整个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总结和精炼,又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人本主义思潮与科学主义思潮各自批判的焦点。黑格尔理性观堪当此任首先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无限的思想张力,这种张力源自黑格尔理性观内在的矛盾结构及由此矛盾结构而产生的理性的自我和解功能、原则。

2. 黑格尔对理性自身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矛盾结构的设定和作用

黑格尔在前人思想发展基础上所揭示和设定的理性概念有其崭新内容,它达到了理性自身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的自我超越性的矛盾对立统一,实现了从抽象普遍性到具体普遍性的转变,超越了知性的对立、片面,既避免了逻辑主义那种因丢失内在生命力、动能而陷入僵硬、抽象的逻辑、范式,又防止了神秘主义(神秘主义)那种因缺乏逻辑、规范而坠入神秘、痛苦的冲动、任性,而真正步入了理性矛盾的自我和解。

3. 黑格尔运用理性的自我和解功能实现了思想与现实的和解,人类由此进入崭新的理性视界

黑格尔通过对理性确定性与真理性内在矛盾结构的揭示和设定,进而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展开而实现了理性矛盾的自我和解,有效地达到了主观的自觉理性与客观的存在理性的统一,进而实现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人类进入了崭新的理性视界,由此开启了人类思想的新天地。

4. 黑格尔的意义与命运

现当代西方哲学在否定、抛弃黑格尔之后,又面临新的理性危机,陷于理性与非理性之争的苦恼。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重建辩证理性、重返黑格尔是一种合理的选择。研究、探索黑格尔理性观,发掘其内在的张力,释放其当代意义,关心它的命运,其实就是关心理性主义的命运,关怀人类自身未来发展的命运。在社会历史巨变中,西方哲学经历了重大转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因其存在一神—逻辑学的性质,不仅与当代社会发生严重冲突,更是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在此背景下,对黑格尔的研究应与时俱进,要认清现当代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又要领会并揭示出黑格尔在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中所释放出来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探索并显示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黑格尔哲学的神化与祛魅;黑格尔对确定性的解读与绝对化;黑格尔的理性颠倒与海德格尔的再颠倒;黑格尔对先验与经验之争的消解与非哲学的兴起。

5. 黑格尔哲学的神化与祛魅

在整个西方文明进程中,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哲学自身的失神祛魅。此间,黑格尔哲学表现出明显的双重性,黑格尔对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批判与继承,既使其失魔祛魅,却又意味着对理性的神化,正是这种思想张力,释放出当代意义,而使黑格尔这条“死狗”不断挨打又不断复活。

6. 黑格尔对确定性的解读与绝对化

黑格尔批判了前人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运动问题上的失足,在真理性的矛盾运动中尽显人类意识的本性。然而,真理性却因其自身绝对的同一性吞食了不确定性,黑格尔哲学被视为冷酷的决定论而备遭否弃。海德格尔认为,从笛卡儿到尼采,都围绕着意识确定性而展开。传统形而上学的更新、转型及其出走,在一定意义上也即绝对确定性的终结与转换。其实,从知识哲学、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生存哲学和语言哲学的转变,就是由对确定性的追求与确信朝向对绝对不确定性的追求与确信,由意识确定性向价值确定性、语言确定性的转变。

7. 黑格尔的理性颠倒与海德格尔的再颠倒

理性主义将世界逻辑化,将逻辑本体化,经过理性的颠倒,理性由把握、表达世界的途径、方法嬗变为世界的根源、本质与动力。黑格尔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代表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通过主体性的张扬实现主客对立的和解之至极。海德格尔对其再颠倒,步入一种新的思想道路。用罗蒂的话说,就是步入无镜的哲学。生命哲学抵制逻辑的绝对确定性、普遍共相、必然性对生命的打压,呵护人类的反抗力与想像力,要用生命取代逻辑,用生存本体消除逻辑本体。

8. 黑格尔对先验与经验之争的消解与非哲学的兴起

黑格尔试图由经验(前逻辑学即现象学)超越到先验(逻辑学),再返还到经验(应用逻辑学即法哲学、历史哲学)之中,将康德一次性设定的先验原则变革为范畴、概念的自我否定、自我设定的矛盾运动。黑格尔建立了先验与经验的和解与统一,并通过“两个凡是原则”将合理性与合法性统一在一起。但黑格尔所实现的先验与经验的和解,最终还是以先验凌驾于经验

之上为前提的。尼采强调,本能优于理性,宣布了理性主义先验论的非法性。但海德格尔反对尼采重又确立起新的“非理性的”绝对的本质和基础,而强调人的存在乃是一种“在世之在”,其根据,就在其自身的存在,哲学就是要追问使存在者存在起来的存在。而在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眼中,要解决先验与经验之争,就要放弃先验的幻觉,彻底解构本质、基础、中心等,没有普遍适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标准。哈贝马斯坚持现代性而对抗后现代主义,从先验哲学、意识哲学走向社会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用交往合理性取代传统的合理性。辩证法经历了黑格尔这位辩证法大师后,既被蒙上阴影,却也焕发出生命力量。

罗蒂说:“黑格尔正耐心地守候在我们行进的任何一段旅程的起点。”^①黑格尔以其思想的张力,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释放出巨大能量,并照亮着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其实,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中,黑格尔由其自身独立的思想特性,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但走出黑格尔与走进黑格尔必须相匹配,由此黑格尔哲学才能释放出当代意义。

^① 罗蒂著,李幼蒸译:《哲学和自然之镜》,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389 页。

前言

在西方文明发展中,对于理性王国的追寻、构想,始终牵动着圣哲的心绪,也关乎现实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和黎明百姓的福祉,而对于理性主义的追寻与把握直接支撑并影响着理性王国的荣辱兴衰。因此,无论是探索理性王国的发展变化,还是研究理性主义的兴衰,都要悉心研究西方文明中的理性这一重要范畴。在西方哲学中,理性(Vernunft/Reason)与哲学密不可分,就像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关于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的探求,还是对诸如真理、规律、客观性、必然性、确定性等的追究,无一不与理性紧密相连。理性是其根据和基础,而它们都是理性的变相:理性是绝对的,它体现在一切事物之中,理性为历代哲学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基石,构成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索;理性又是相对的,它通过具体事物得以展现,有其不同的版本和变相,它在不同的事物中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和方式,而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理性的表达又因其条件、能力、视野的不同而各有差异,由此演绎出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前者体现了理性的逻辑普遍性无所不在的规范性,后者则体现了理性的自我超越性无所不能的推动力。其实,两者都只是理性的无限张力不同的演绎和表现。

黑格尔的理性观是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集大成,他对理性的透视和把握之宏大、深刻及多层次面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黑格尔通过对理性概念在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矛盾的发掘及对理性自身确定性与真理性矛盾结构的解读,冰释、消解了前人在理性发展过程中难以把握的诸多矛盾和难题(如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性与现实等对立和矛盾)。同时,黑格尔对于体系完整性的追求和对历史意义的终极性理解,实际上与他对理性的自由本质的界定和他的辩证法的革命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而造成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同时,黑格尔对于绝对、纯粹的偏好,驱使他将理性嬗变为无人身的绝对精神,最终使本来最具主观能动性的理性主体反倒成了无主体的东西了。黑格尔理性观的这种矛盾的二重性实际上构成了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起点,同时也成为备受批判的焦点。对于黑格尔的批判,既有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深刻批判,也有科学主义思潮的尖锐否定,还有当代辩证理性观的重建。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叔本华直接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公开较量并开启了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到当代西方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社会合理性的重建,几近两个世纪,其间人类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然而,对于黑格尔理性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否定,非但没能像批判者所想像、承诺的那样,给人类以解放和福音,反而使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困惑和危机之中。反倒是那被否弃的东西即黑格尔的理性观依然给人以希望并以此照亮人类的存在及意义。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消解和攻击尽管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理性的发展,拓展了理性的层面,但是由于它难以找到和解、统一理性内在矛盾的途径,终究只是理性主义步入窘境、难以言表,它既无力拯救西方文明的衰落,也难减缓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样,现代科学哲学对科学合理性——逻辑合理性的片面追求和重建,对理性有所发展,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夸张,既无法揭示科学历史及科学理性发

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也无法真正摆脱它自己所竭力反对的“基础主义”阴影,更无力承担主导西方文明健康发展的重任。当代解释学对于合理性的重建做了有益的探讨,但因其对理性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社会性与个体性、工具与目的、逻辑性与历史性的矛盾关系无法澄明,最终也难以走出理性的困惑。

对现当代西方哲学所陷入的这种矛盾与困境,冷静、认真的反思是必要的。一方面,我们不敢苟同那种杞人忧天的过度悲观失望,我们确信理性的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生命力,相信理性的进步和发展往往伴随着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另一方面,我们强调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中这种矛盾与困境的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黑格尔理性观的批判中多有曲解和逃避。其实,黑格尔的理性观并非仅仅是他个人天才的洞见和艰苦卓绝探索的结果,同时它也是人类理性发展进步的产物和结晶,正如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揭示出“目的性”是理性的核心内容在今天依然有效一样,黑格尔对理性的矛盾与和解这一本质性特征的揭示,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其应有的思想效力。尽管黑格尔对理性的解读和设定,很难超越传统哲学的视界和意识哲学的局限,但是黑格尔通过对理性自身的逻各斯与努斯这一矛盾的对立统一的透彻领悟和凸显,并由此揭示的理性矛盾内在结构及对理性矛盾的具体展开,解开了事物变化、运动、发展及其根源之谜。他对理性矛盾自我和解原则和功能的辩证解读,更是显现出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在的同根同源与对立统一,照亮了人类对世界、人类社会、思维和对自我的认识道路。如果说柏拉图由于对理性的抽象和绝对化而构筑起理念王国,使人类走出了晦暗的感性洞穴,那么黑格尔则因为对理性的矛盾与和解的凸显,使人类脱离了固执的知性的峡谷,并将现实王国也是理性的王国交还给人类。此后,才有了所谓的非理性主义的反动,才有了后现代主义的崛起。

黑格尔理性观的确立标志着人类意识发展进入了一种辩证理性的层次,由此带来的崭新的理性视界则预示了传统哲学(知识型)向现代哲学(实践型)的转变,对于它的理解和应用并非几代人就能完成的,这就像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的最好理解还是由相隔遥远的黑格尔、海德格尔提供的。沿着黑格尔给我们凸显的理性的矛盾与和解这条线索,我们不仅可以找到黑格尔解决前人留下的理性难题的关键所在,而且还可以寻到当代人在理性问题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的症结,这正是我们认真深入研究黑格尔理性观的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当然,对黑格尔究竟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无法强求一致,这就像我们也不能强求黑格尔理性观对后人产生的影响应该只有一种定势一样。这就使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在现代社会》这本论文集的编辑者 Ardis B. Collins 在其引言中的感慨:“人类的存在,特别是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存在,是在几种方式上被不同的对待(即:对抗、擅用、对话)。”他指出,在他所编的这本论文集中同样也向我们显示了“在现代社会黑格尔(所遭遇到的)所有这三种待遇(论述)——对抗、擅用、对话,甚至是一种复合体,是这些待遇的微妙的混合。”(Ardis B. Collins: Introduction Hegel and Other, Publish in “Hegel on the Mordern World”, Edited by Ardis B. Colli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X)对待黑格尔理性观会有不同的态度,必然也会由此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是,这些不同和差别并不(实际)影响我们对于它的共同的关注(这种关注,既可能以肯定的方式出现,同样也可能是以否定的方式出现)。因为我们深知,对于黑格尔命运的关注,对于理性主义前途的关怀,就是对我们人类自身命运的终极关怀。

在社会历史的巨变中,西方哲学从近代哲学到现当代哲学的发展,经历了重大的转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因其固有的存在—神—逻辑学的性质,不仅与当代社会发生了严重冲突,更是陷入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困境而难以自拔,这在现当

代哲学的视界中便被冠以“传统形而上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解构。现当代哲学因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本体论和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摧毁，对理性自我绝对确定性、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边缘化，使得西方哲学的发展由意识哲学、认识型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实践型哲学，用语言对话、交往行动取代了意识反思、概念辩证法的独白，从而使得哲学由抽象的逻辑概念的阴影王国、思辨的精神世界朝向事物本身，返回生活世界。对西方哲学的转型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仅是我們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重要前提，还可为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活力。

时间距离将我们与近代哲学拉远，但也正是几近两个世纪，凭借着这种时间距离，我们却可以更好地与近代哲学对话并对其重新评估。当我们从现代地平线上阅读近代哲学这一文本(Text)发现，近代哲学与由其自身释放出的现当代哲学之间生发出巨大转变。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潮与当代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伴随这种冲突，在现代哲学中发生了重大变更并由此取得了一定成就。客观上这种变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因此，对于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哲学转型问题，我们应当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我们对待黑格尔的研究，更应与时俱进，既要认清现当代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所取得的实质性进步及意义，同时又要领会并揭示出黑格尔在当代社会历史发展中所释放出来的意义。否则，我们便有可能仍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视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质性的进展视而不见。这就需要我们就传统形而上学与当代社会之冲突的视角，对以下六个方面加以悉心透视与研究：

第一，社会历史的巨变与哲学转型。尽管哲学不能以“时代精神”的代言人自居，但哲学（尤其是走在时代前沿的哲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有着一定的因果关联，或者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从笛卡儿建立起自我主体的确定性，近代西方哲学登上了“思维的陆地”^①，到“对于一切人就是一切的一切”^②的黑格尔，将一切的一切都统摄到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唯心论体系，而宣告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其实只是告一段落）。其间，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历经沧海桑田，整个西方社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大工业取代手工工场，与这些社会历史变化相协和的是：近代哲学经历了由感性哲学、知性哲学向理性哲学的进展；在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也经历了二元对立进入抽象的同一，再达到绝对唯心论基础上思辨的对立统一。但是，更大的社会历史的巨变与更深刻的哲学转型却随之而来。

近代哲学是通过黑格尔完成并达到其顶峰的。黑格尔哲学在纯粹逻辑概念基础上，强调以绝对理性为一切的一切之存在和活动的动能、本质和根据，一切起源于绝对理性又回复于绝对理性，最终建立起以绝对同一性为核心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理性王国。一方面，确立起理性的绝对权威，理性取代上帝而无所不能。然而，在理性王国歌舞升平的背后却隐伏着危机和矛盾。另一方面，当社会历史继续向前迈进，尤其是当西方文明经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时，伦理价值观、宗教信仰、政治文化观念等的巨变，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所有这些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都向近代哲学发出了挑战。传统理性哲学所做的“理性承诺”，在社会历史的剧烈动荡中被撕成了碎片，传统理性主义更是在各种危机重压下不堪重负而暴露出其固有的虚假、苍白和无力。更有甚者，理性主义非但未能实现其许诺，反倒是由于对主体绝对性的凸显，而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普遍的异化现象，造成了个

① 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9页。

② M. J. Inwood: Hegel,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of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 6.

体存在的悲惨状态。由近代哲学苦心营造的理性王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哲学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用社会历史的变化进行自身转换。

这样,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所表现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及神秘的努斯主义,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视野中被冠以“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备受怀疑、指责和批判。当人们在一次又一次地将黑格尔视为“死狗”竭力对其加以否弃,但却又难以真正割舍时,而意识到人文科学的历史连续性。一场全面、彻底的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运动悄然兴起。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要取得与现行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步,甚至走在历史的前沿,就必须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禁锢,实现哲学的自我转型。由此,便生发出由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实践哲学的转向,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哲学由此走上了由逻辑概念的王国转向人的本真存在和活动,转向事物本身的道路。

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首先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否定和变更表现出来。自从巴门尼德论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此就为后人不断论争而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索,但由于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争论主要局限于意识层面,而导致、形成了西方哲学的知识型特征。因此,论证、阐述思维与存在(及其由此而引申、嬗变的心物、灵肉、主客等)孰先孰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有与无同一(一元论与二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及如何同一(反映论与先验论、经验论与唯理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等等,便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内容。^①

黑格尔之后兴起的各种哲学流派,无论是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唯意志主义、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还是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对将哲学的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传统形而上学的做法,都表示怀疑、批判和否定,进而重新审视了哲学的任务、对象、方法和功能,甚至对哲学自身的性质也加以反省。因不满足于传统形而上学知识型哲学固有的抽象性、思辨性的局限,而转向将哲学更多地与现实具体的人相勾连,而被近代哲学所漠视的人的情感、本能等却得到了应有的合法地位。具体地说,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不是彻底地否定、抛弃这种大而全、空而假的提法,就是在解决思有、心物、灵肉、主客关系时引进了行动、实践等非理性的因素,或者从人的语言、交往活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重新把握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停留在意识哲学的层面,而是进入了语言哲学、交往实践之中。由此,开始了由知识型哲学向实践型哲学的转向。^②

第二,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与当代社会的冲突。笛卡儿以其“我思故我在”确立起自我的主体性地位并将整个近代哲学奠定于此基础上,他的哲学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的雏形;其后,康德经过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综合,对形而上学的论证,对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批判(尽管康德宣称超越现象界去把握世界整体、上帝和灵魂是理性的僭越),最终他在现象与本体二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黑格尔则在其绝对唯心论基础上,运用概念辩证法的暴力,消除了康德的知性二元对立而进入思辨理性的(思有、主客、灵肉、心物)全面统一与和解。黑格尔以绝对理性为其起点与终点,将万事万物都认作绝对理性的外化、客观化,而认精神、意识、认识为绝对理性的自觉(状态、形态),这样,思有、主客、心物、灵肉的统一与和解就成了绝对理性的(自身客观理性与自觉理性)自我同一与

① 俞吾金著:《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② 刘放桐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7页。

和解^①。但是,黑格尔自诩统摄、和解了一切的一切之绝对唯心论体系,留给后人的却是空前可怕的断裂与鸿沟,这种传统哲学模式的神学性质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严重冲突。

叔本华、罗素、阿多尔诺这三位分属不同流派、思想风格迥异的思想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揭露并批判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并强调它实际上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本体论证明所表达的上帝观念与上帝实在的绝对同一性神学原则更是奠定了绝对唯心论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在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思潮中,无论是对绝对同一性的顽强地追求,还是对绝对先验原则、第一原理的固执坚持,或是对逻各斯中心论的突出,无一不与本体论证明相勾连并由此被打上深深的思想烙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同意海德格尔对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传统哲学的神学性质的揭示和批评,^②也承认哈贝马斯关于从近代意识哲学向当代语言哲学、交往行动理论的演进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实质上也就是失神祛魅的进程的指正。^③

安瑟尔谟从上帝是人心中能够想到的最最完满无缺的观点出发,断言完满无缺的东西不可能连存在这种属性都没有,否则它就不是完满无缺的了,由此证明完满无缺的上帝存在无疑。安瑟尔谟这位曾因无法用理性方法论证上帝存在而备感焦虑的神学家,万万没想到他的这一本体论证明一问世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继而为理性主义哲学家继承、发挥,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对此加以援引,以作为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支柱并大有发挥。康德自以为对本体论进行强有力的驳斥,但他却没想到由此引来的却是黑格尔更加有力的反批判和对蕴含于本体论证明之中的思想原理的深入发掘与全面系统地展开,贯彻于黑格尔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之中的“实体即主体”,“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凡是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即是现实的”等基本原则无一不是对本体论证明的具体运用和发展。^④而康德也被认为以一种否定的方式贯彻了本体论证明的思想原则。^⑤如果说,笛卡儿因确立起绝对自我主体性原则而使近代哲学登上“思维新大陆”,那么,实际上支撑这“思维新大陆”的却是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的思想原则。这样,要彻底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在现代哲学家(尤其是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看来,就必须首先抽掉这种支撑。因此,对于黑格尔哲学神学性质的揭露和批判及其对黑格尔思想理论中所透显出的本体论证明的昭示、攻击,便成了现代哲学思潮的先行任务和目标。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在对本体论证明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中,通过对理性颠倒功能的发掘与运用,理性由原来用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万能的媒介、途径和方式,逐步嬗变为上帝存在的根据和本质,进而理性取上帝而代之,理性自己最终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理性之上帝尽管用理性证明、逻辑演绎的方式取代了人格化上帝原有的盲目信仰和想像的途径,但是其神学的性质并未改变,仍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也即用想像代替现实,将观念等同于实在,两者都只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高高在上的虚构的世界。形而上学在推翻了上帝并以理性取而代之后,所建立的理性的王国,非但没有让芸芸众生感到安适,它所作的理性承诺非但没有带给人间以安居乐业,反倒是将人们逐出了原有的家园,变得无家可归而不得安身。人们陷入从未有过的异己的深重苦难之中。恐怕这就是黑格尔哲学、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被作为神学

① 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②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29~830页。

③ 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

④ 章忠民:《理性与信仰——从本体论证明谈起》,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5期,第58~59页。

⑤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的翻版,在当代社会遭到猛烈攻击乃至抛弃的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原因。它成为对当代社会推进平民政治、多元文化、多边对话等社会发展进程的障碍,也成为哲学自身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禁锢。因而,彻底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学性质、实现近代哲学的转型就成了大势所趋。

第三,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与出走。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突破是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并完成其转向的另一个不可缺失的方面。巴门尼德完成“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论证,一方面框定了后世哲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却同时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同一性思维范式。追求同一、排斥差异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这一点无论是在一元论那里还是在二元论那里,无论是辩证法运动观还是形而上学静止观都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二元论和形而上学对同一的标准、尺度比一元论和辩证法更加静止、绝对、僵死而已。

近代哲学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及其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遭到现代哲学诸多流派的抨击和否定,从克尔凯戈尔用“非此即彼”消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辨的正反合题的“亦此亦彼”^①,到波普尔的反辩证法,^②再到科学主义思潮诸多流派视黑格尔思辨逻辑为不合逻辑,^③认辩证法为诡辩法,直至阿多尔诺以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绝对肯定性,^④竭力恢复备遭排斥、压制的非同一性、差异性,而坚持非此即彼的否定性(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现代哲学诸流派普遍地抵制、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对绝对同一性的凸显与追求。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大多已深深地意识到在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笼罩下,任由“意识暴力”肆虐,不仅一切的一切皆被纳入正反合题的魔法,削足适履地纳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即扬弃)辩证肯定的三段式圆圈,这种以辩证的否定取消了肯定,将否定变成了肯定的一个环节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的做法,势必导致听凭辩证法(使用者)对一切加以剪裁、度量,造成理论思维方面的独断、抽象和任意;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追求绝对同一性的辩证法其合理性一旦与合法性相结合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方面带来的就不只是对现有的社会文化制度的肯定性的辩护,而更可能导致(阿多尔诺并非危言耸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⑤因此,现代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与反驳,真正来说,是与恢复辩证法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给予差异、非同一性以合理合法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同现代社会对个体权利、价值的关注,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对文化霸权、帝国主义技术统治的抗拒更是息息相关。

从传统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出走,给现代哲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其中,对于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绝对同一性思维模式的抛弃,使人由自我意识所设置的对象化的世界回到了世界本身,回到了人自身。同时,对于辩证法真实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的强调,也摆脱了对那种混淆肯定与否定之界限,用否定之否定即思辨的肯定消解、替代否定的魔法,从而恢复了是与非之间的界限,保留了事物自身不断的开放性。

第四,传统形而上学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确信之失效。本体论证明之所以能达到上帝观念与上帝存在之间的同一,还是仰仗比这两者更为在先的绝对无条件东西,那就是来自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它通过逻辑普遍性、必然性得以表达:凡是建立在这种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基础之上,获得逻辑普遍性、必然性的东西,也就是绝对可靠的东西。因此,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

① 晏可德译:《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② 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62页。

③ 波普尔著,傅季重、纪树立译:《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62页。

④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⑤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一切,创造了人,不如说是人的理性自我赋予上帝这种创造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在本体论证明的这种神学性质驱动下,启动了近代哲学对于不证自明的、超越于经验之上的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和论证。因为从这种第一原理、绝对基础和本质出发,不仅可以保证思想理论体系的普遍必然性,还可以贯通经验与先验。在这一点上经验论与唯理论、规定的判断与反思的判断都是相同的,只是在演绎的取向上相反而已。因而,从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有所谓的自我、实体、单子和先验统觉、自我、绝对同一、绝对理念;从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到霍尔巴特、狄德罗、费尔巴哈便有了形式、物体、感觉自我、物质、自然等。所有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中的这些核心范畴都表达了他们各自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及其把握,近代哲学对于第一原理、绝对确定性竭力追求的强烈的理论动机,最终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泛滥盛行。

传统形而上学所确信的理性自我的绝对确定性,并非绝对确定,由此而来的普遍必然性亦非绝对可靠。因为只要是建立在这种逻辑演绎证明之上的东西,它本身也要接受逻辑论证。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能够解释、论证一切的前提,其本身必然无需解释、论证,也不能被解释、论证,能成为一切的一切之根据的根据本身不可能再有根据;否则,它就违背了逻辑演绎论证的操作准则,将会陷入无穷的循环而无法成为绝对的确定性,也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然而,这样却把理性自我逼到了它的反面,原来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能够带来普遍必然性——理性第一原理、绝对基础或绝对确定性,其本身的前提却是非理性的信仰、信念或确信。这真是天大的秘密。然而,正是非理性主义者首先发难,道破了理性主义的天机而使其陷入理性危机之中。从这一点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和把握,为什么在黑格尔完成了庞大严密的理性体系之后,他的天才之作非但没有给理性主义发展带来长治久安的绝对确定的基础,反倒引发了非理性主义的爆发和兴起。因为,黑格尔思想体系既是对理性王国的最完美的建筑,同时也正是在他对理性特性、功能和使命的炉火纯青的发掘、显露、赞誉之际,将理性的致命缺陷也暴露无遗。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对普遍必然性的独断的设定和确信,在现代哲学中遭到普遍的怀疑和反对,先验论的绝对普遍必然性不再绝对有效,而是让位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关注,语言学的对话、实践哲学的交往取意识哲学的绝对确定性而代之。

第五,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与边缘化。无论是本体论证明将观念与实在等同,还是辩证法对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和夸大,或是先验论对普遍必然性、绝对确定性的盲目确信,这其中有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对观念的性质的颠倒与对其功能的夸张。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Logos)是要给不定型的火(不确定性)以确定、规范、命名。但在其后的古希腊哲学发展中,逻各斯所体现出的语言、词语的特性和力量,却被逐步夸大、凸显,到了柏拉图那里,本来被用以表达、概括,呈现世界万事万物的逻各斯,却反客为主地成了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本质,一切事物反倒成了作为逻各斯的理念之模仿和变相。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所表现出的逻各斯中心论倾向有所警觉,但却无力也无心对其加以真正阻止。其后,逻各斯主义所孕育的这种对逻辑概念的独立性及其作用的凸显在近代哲学中得以不断扩张,直至黑格尔发展出典型的逻各斯中心论。

在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中,衡量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有无存在和运动的根据及其价值和意义,唯一的标准就在于它能否通过概念得以把握、表达,能否进入逻辑范畴的演绎之中。凡是无法用逻辑概念加以表达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凡是无法回归到自身纯粹概念状态,不能作为概念的外化、客观化而存在和运动时,它就被排斥在哲学之外。

这种情形无论是在唯理论者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那里,还是在经验论者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休谟那里,也不论是在黑格尔、康德、费希特、谢林那里,尽管对逻辑、概念夸张的程度有所不同,具体运用把握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也即都认为逻辑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和根据,认识和把握事物也就是要达到对事物的普遍必然的概念认识。

近代哲学把事物概念化、用逻辑排斥一切非逻辑的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做法,遭到现代哲学诸流派的强烈反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戈尔、柏格森、萨特等都反对逻各斯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具体事物一旦被概念化而成为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的普遍共相,就不成其为事物,而现实的个人一旦没有了血肉之躯,失缺了本能情感也就没有人的意义和价值可言。非理性主义思潮指正传统形而上学这种逻各斯中心论倾向,对于事物的本身严重肢解、歪曲,对于人生的无情的抽象而使人蜕变为没有血肉的逻辑动物、符号动物,从而导致对人的自由、价值和意义的漠视与压制。

他们都强调对于人和事物的研究和把握,不能听凭逻辑概念的肆虐而将事物从其具体环境中剥离并使事物本身抽象、分解,更不能将人与其本能、情感剥离而使人成为苍白、抽象的符号、图式,使人失却其现实性和具体性。他们主张应抛弃僵死的、固定的理性概念的图式而转向生动活泼的直观和洞见,进而由静止不动、僵硬固着的概念、逻辑进入流变的绵延不绝的生命之流、生活之流。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则进一步主张用语言的对话、交往行动来替代逻辑概念的反思和独白。把逻各斯中心论有关存在的研究,由对象性的概念把握或符号模式转换成为让事物存在起来,让事物说话,让事物在其自身更为丰富多彩的语言场所、交往行动场所中(而不仅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化的逻辑概念的反思),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对于逻各斯中心论的批判,并没有像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福柯那样,完全否定哲学反思和逻辑概念的应有的作用。但是,他们却能消除逻辑概念的对象性而较好地保留其流变性,在此,逻辑概念与事物,与进行思想活动的人的关系,既不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对立,亦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水火难容,而是将其边缘化,从而使逻辑、概念回到了它们应有的位置,也即既可以视其为人的思想活动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途径,亦可以看作为事物自身为自己构筑的显现自身的场所。但是,最为重要的则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逻辑、概念都将不再是隔断人与世界人与自身的沟壑、障碍。即使有所遮挡的话,也是与显现不可分离的。因为,在这种被边缘化了的逻辑、概念中,我们不会因对象性思维模式而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之外,也不会将我们(思想者)放在我们自己的对立面。

第六,当代地平线上的传统哲学。由叔本华、尼采率先发难,经由后继的实证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再经过分析哲学的批判,传统哲学被驳斥得体无完肤,传统形而上学成了逻各斯中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及神秘主义的总汇。然而,有趣的是,尼采这个反形而上学家却被海德格尔称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而被公认为摧毁了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却又被德里达称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而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奎因等在其后期亦因意识到形而上学的重要而有所谓的本体论转向。那么,是否真像海德格尔所感叹的那样:“哲学就是形而上学?”

传统形而上学思潮既有与当代社会冲突的一面,同时在自身中又不乏冰释这种冲突的合理因素,甚至于其中还可以发挥、引申出解决当代社会文化冲突的可贵线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社会历史的巨大变更中,近代哲学在面对各种思潮猛烈抨击,并未土崩瓦解,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而是通过转型、自我更新、与现当代各种思潮的融合,而活在了现当代西方

哲学之中。

新康德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在现代哲学中得以形成、发展并产生一定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传统形而上学思潮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适应和自我更新,说明了哲学发展从来都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历史性。例如,新黑格尔主义在黑格尔被看作一条“死狗”而遭抛弃时,却仍能坚持黑格尔哲学中活的东西,并针对黑格尔哲学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及现代哲学思潮对它的批判,而扬长避短,努力发掘和显示黑格尔哲学中尤其是其早期思想中对生命、爱等非逻辑、非概念因素的关注,以求得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全面具体的把握。尽管新黑格尔主义就像黑格尔学派一样日落西山,但是它却为后人重新理解黑格尔带来了某种启示。

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的哲学中,一方面,传统形而上学思潮的种种缺陷得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智慧却重现其生命活力。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用心解读,使得黑格尔的“经验”概念重新闪亮,照耀出人类意识运动的三种基本法则,从而为寻找被遗忘了的存在之根基指明了方向。从此,存在不再作为人的对象化的东西而被苦心竭力地认识,存在是通过为自己建筑存在的场所而不断释放自己,存在在语言中回到自己的家。伽达默尔不仅重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黑格尔逻辑学也进行了深入探究与发掘。在他看来,在黑格尔概念辩证法运动中蕴含了哲学解释学对话的原型,但是哲学不能停留于黑格尔辩证法式的独白^①。哈贝马斯则秉承了黑格尔理性自我和解统一的传统,在现代哲学面临非理性主义思潮冲击和理性自身内部的分裂等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却试图通过交往行动统一一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

与现代哲学其他流派相比,真正对黑格尔哲学及整个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深入有力的批判并因而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当首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然而也正是这三位既分属于三种不同流派(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却又都通过同一流派(哲学解释学)而联结起来的三位思想大师,使得近代哲学的道路得以在当代社会延伸。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通过这三位思想家,传统形而上学在现代性的地平线上获得新生、得以展现。其实,真正使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得以勾连的,乃是因为他们都各自走进了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而又同时都能满载而归。通过他们艰苦的解构工作,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所固有的对象性思维模式、人类学观点(人类中心论)^②、神学性质和片面的理性主义倾向等,基本上宣告了自己的使命之终结。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却由此获得新生而被带入了当代社会继续着自己的道说。

但是,在当代地平线上,传统形而上学的如此境遇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海德格尔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③,意味着什么?

① 张志伟译:《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② 章忠民:《从一般主体到主体的演变及其意义——谈海德格尔对表象性思维的探源及其批判》,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

③ 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52~153页。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前言	1
第一章 理性观念的提出和演变	1
第一节 古希腊哲学中理性观念的提出和形成	1
一、逻各斯与努斯的提出	1
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努斯与逻各斯的发展	3
三、亚里士多德综合努斯与逻各斯的尝试	5
第二节 近代哲学关于理性思想的发展	6
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	6
二、斯宾诺莎的实体自因和莱布尼茨的单子	7
三、经验论对理性观念的理解	8
第三节 德国古典哲学中理性的逻辑进程	9
一、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	10
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	11
三、谢林的绝对同一	13
第二章 黑格尔的理性概念	15
第一节 逻辑规范性:作为本质与普遍根据的理性	15
一、对知性范畴论的批判	16
二、逻辑规范性	17
三、语言和反思的颠倒	19
第二节 自我超越性:作为自由精神的理性	22
一、内在的超越与超越的内在性	23
二、理性超越的途径	25
三、理性超越的方向:从有限到无限	28
第三节 从知性到理性	31

一、知性对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割裂·····	31
二、理性对知性的超越与扬弃·····	32
第三章 黑格尔理性的发生学 ·····	35
第一节 确定性与真理性·····	35
第二节 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性·····	37
一、这一个：自我和对象·····	37
二、这一个：意谓与共相·····	38
三、认识与对象关系的反转·····	39
四、感性确定性的真理：共相、普遍性·····	39
第三节 自我意识的确定性·····	41
一、自我意识、欲望、生命·····	41
二、主人与奴隶·····	43
三、自由与苦恼(意识)·····	45
第四节 理性确定性·····	46
一、观察的理性·····	47
二、行动的理性·····	48
三、自在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	49
第四章 黑格尔理性矛盾的展开 ·····	51
第一节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51
第二节 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	54
一、历史的回顾·····	55
二、“目的理性”的确定·····	57
三、目的理性的内在环节：主观的目的，工具，实现了的目的·····	58
四、工具理性对目的理性(超越)的高明之处·····	61
第三节 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	62
一、历史与逻辑的矛盾·····	63
二、对历史的合理性解释·····	67
第五章 上帝之死与哲学的失神祛魅 ·····	72
第一节 黑格尔对本体论证明的祛魅与神化·····	72
一、黑格尔对神学实证性的批判与对宗教生活的神秘观念·····	73
二、黑格尔对安瑟尔谟证明的改造与应用·····	75
三、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一神一逻辑学性质的批判与反省·····	78
第二节 黑格尔的“苦恼意识”与“上帝之死”·····	82